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钟敬文自选集

钟敬文◎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ZHONGJINGWEN ZIXUANJI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ZHONGJINGWEN ZIXUANJI

钟敬文自选集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JINIANJI

钟敬文◎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敬文自选集/钟敬文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423-4

I. 钟… II. 钟… III. ①民俗学—中国—文集②民间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文集 IV. K392-53 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32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ZHONG JINGWEN ZIXUANJI

钟敬文自选集

钟敬文 著

项目统筹:杨小兵 责任编辑:李 荣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4.75 插 页 1
字 数 533 千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平 汤一介 许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宋贵伦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枬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逸

编委会主任 常卫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史秋秋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杨学军 陈鹏

陈之昌 陆奇 辛国安 庞微 单允茹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强 刘伟 杨小兵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林 韩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8年11月

第 1 版自序

世途惊险曾亲历，

学术粗疏敢自珍？

——《九十自寿》次联

约略说来，我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是在 1924 年的夏秋间。它距离现在已经将满 70 年了。

那正是轰轰烈烈的，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文化运动的“五四”之后的几年。政治、文化两方面的运动各以另一种方式在继续着。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刊行(1922 年)和收集、发表民间文学作品风气的广泛流传，就是那种新文化运动一个有机的和有利的部分。当时，作为一个刚见世面的青年，像触了电似的，我蓦地被卷入了这文化的狂潮里去。除了奋力学习新文学之外，我又不知疲倦地向周围的人们采集民间歌谣、故事。这种活动，虽然在接触《歌谣》周刊之前的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五四”前一年发刊的《北大日刊》的《歌谣选》，早已影响了许多地方报刊，从而也引起了我的响应)。但是，它(《歌谣》)的出现，无疑对我这方面的活动大大地起了添柴注油的作用。我

不仅在尽力采集、记录那些野生的文艺，而且还有意地探索它、谈论它——对它进行一种理论性的思维。

我在1924年写作了15则《歌谣杂谈》(陆续发表于《歌谣》周刊)。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习作。但是，不要忘记，它是我少年时期对这门学术倾注着满腔热情写出来的，它也是我此后数十年这方面学术活动早期的“星星之火”。

1927年秋天，我由岭南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这时候，那原来在北京兴起并且影响到全国学界的歌谣学(或者说是民俗学)运动一时已经退潮了。一些本来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显过身手的新进学者，正好聚集在中山大学的文学院。校里的某些负责人又对这方面学术活动有些理解。顺理成章，中山大学的部分教师就成了举起那几濒于熄灭的学术火炬的接力人。这时我对这门新学术已经上了瘾，而客观上又需要我、容许我去着手工作。我怎能不尽力以赴呢？

这一时期，我先后参与建立民俗学会，编辑民俗刊物及丛书，管理民俗学传习班等事务，当然也还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刊物上(稍后，大都收入《民间文艺丛话》一书中)。其实，那时我不仅缺少应有的工作经验，连比较基本的专业知识也不怎样具备。所凭借的，只是一般少年向往和肯干的热情、蛮劲。我的那些文章虽然还是习作性的，但是所从事的活动却并非没有价值。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说，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不仅确固了我从事这方面学术的信心，也增进了对这方面工作的知识和活动才干。它正是我后来走向学术高峰期的必须准备。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对那使我得到长进机会的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它的负责人表示感谢——虽然那年暑假，我就被那位假道学的校长辞退了。

二

过去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在经历上更有重大关系的是，我从广州到杭州以后的那几年的境遇和活动。这些境遇和活动，不管是在学习方面、在研究方面，或是在学术事业的建立和开拓方面，对我都有较大的益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我一生学术生活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吧。

在这段时期里(1928年秋至1937年秋)，我的活动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段落。从1930年秋起，我辞去了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教职，转到一个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行政人员(如民众教育馆长和科长等)的特殊专门学校，讲授“民间文学”课。这是第一个段落。这时期，我除了讲课外，还和一些有同样学术兴趣的朋友，创办了近于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又在进行过探索工夫的基础上，写了几篇论文，如《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地方传说》和《金华的斗牛风俗》等。这些论文，有的曾经试图运用唯物论的观点，但一般的观点仍是英国人类学派的。不过比起中大时期所作的急就章，在收集材料和考虑论点上，用力更加勤劬，思索也稍为精细了。这在自己治学的道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进境。自然，它距离成熟程度还是有些遥远的。

从1934年春起，我暂时离开了杭州(当时我已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去日本学习，至1936年夏回国，这是第二个段落。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我主要的活动是学习。在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我虽然对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解及探索有了一定进步，但是总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跟它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都太薄弱，只靠它不可能在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如果要进而推动全国这方面的学术运动，就更没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须有个机会，让自己去打好学业基础才行。由于当时我们已经与国外的同行有些学术上的交往(例如彼此互赠书刊

或把论文寄到国外去发表)，于是，我重新做起留学的梦——少年时曾经做过的梦。我辞去了教职，毅然到东京去当苦学生。

在那座9层楼的大学图书馆里，我每天(除了星期天)要花上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我贪婪地阅读着能够入眼的有关书籍，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也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原始社会文化史以及文艺理论、美学等学科的理论学习。作为图书馆知识的补充，就是在假日里畅游神田和早稻田大学门前的书店街。虽然在知识的吸取上不免有些狼吞虎咽，咀嚼消化得还不够，但是，总算在从事学术的知识的基础上铺上了几块大石头。这是我以后在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的重要凭借。它无疑是我的一份重要的治学资本。自然，为了整理自己的见解和换取生活资料的需要，当时我还写作一些论文(如《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盘瓠神话的考察》等)，发表于国内外的专门刊物上。这更是检验自己学力的机会，也增强了自己治学的信心。

1936年夏，我从东京回到杭州。次年秋，因敌人炮火迫近，抱病离去那里，这是第三个段落。这一年，我主要的职业仍是教学，实际上还进行了不少学术活动。我为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两个专号：《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民俗文化专号》，又筹办了一次“民间绘画展览会”以及刊行过两册“民间文化小丛书”。这时期，我对民俗学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就是它的范围应该扩大，不能再为英国民俗学会过去所刊手册的范围所局限。从上述所出的刊物和办展览会等活动，约略可以看出我这方面思想变化的轨迹。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应该同社会文化实践相联系的观点，我已在这时期的第一段落中意识到它，到这时不过更加增强罢了。由于日本军阀的侵略更见咄咄逼人，我们进一步解广大民众的思想、文化，并利用他们习惯的事物和思考方式(包括文艺的表现方式)去进行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就更加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了。

总之，我前后在杭州度过的几年（中间部分时间在海外）中，我的学术经历和成果，不仅比前期有所提高，而且对我以后大半生这方面的活动，是具有相当决定意义的。

三

日寇的加紧侵略和我国人民的坚决抗战，暂时打断了我原定的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但它也给我的思想和学术活动注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它像某些民间故事里所说的，那具有超凡力量的神仙，把枯鱼点化为活泼泼的生物。

抗战的第二年夏天（那时我在桂林教书），我应邀至广州（当时的南方抗战前线）四战区政治部，从事对敌人和民众的宣传工作。民俗学一类的工作当然暂时抛开了。面对着铁与火的战争，面对着广大从事抗日宣传的青年战友，我有着新的庄严任务！在促进、提高他们宣传（特别是以文艺为手段的宣传）的效力上，我在竭尽自己的力量。我热诚地对他们讲话，并写作鼓舞性的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特别是后期所学习过的关于社会、艺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严肃的生活实践里得到孵育和印证。它迅速活跃起来，并保证了它以后的不断成长。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环境的巨大作用外，还有人的因素在，那就是当时在政治部内外一些进步同志的感化和切磋。尽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作梗，我不能在那种环境中久住，但这段经历对我的终生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首先，是对于下一时期学术思想、著作的影响。

由于政治的逼迫，从1941年起，我第二次到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它的临时校址设在广九铁路广东境内最北边的车站所在地坪石镇）。我每年重复讲授“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功课，这使我对于文学理论、诗学等的原理、问题，有机会做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思考。我先后

写作了一些长短不等的文章，如《略论格言式的文体》、《风格论备忘》、《我与诗》等文章；而《诗心》那个小册子的思想，在我的诗论上更多是有代表性的（该书大部分文字，后来并入《诗论》中）。总之，这个时期，我的文艺思想一般已经定型，在性质上也逐渐趋于成熟。

这也许可以在我的学术思想及其活动上，概括为第二个高峰期吧。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政府悍然下了“戡乱令”，他们要把一切进步力量从大陆上消灭掉和驱除出去。我跟中大一些被看做“危险分子”的教授这时都受到“解聘”的待遇。我们逃到香港。在民主党派创办的达德学院文学等系任教。我教的是“民间文学”和“文学专书选读”等课。教师、学生大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许多师生不是中共党员，就是民主党派成员。因此，我们的身份既是授业的教师，又是政治活动的指导者。自然，我们没有以政治代替或压倒科学。我们重视专业知识的传习，不过带有相当的倾向性，不是一般的学院式教学罢了。我们文学系（后改称文哲系）先后出版了《海燕》、《关于历史剧》等文艺理论兼创作的专集。我的《谈王贵与李香香》、《诗与歌谣》，就是刊载在这些集子里面的。这时候，香港进步文艺界人士为了配合两广方言区革命宣传的需要，提出用方言创作的理论问题（同时一部分人已经在进行创作实践）。我因为是方言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一连写作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并主编了一个以理论为主的《方言文学》专集。此外，也写作了《海涅和他的创作艺术》，纪念郁达夫、朱自清等作家的文章。这段时期虽不长，但文艺理论活动颇活跃，以至有些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菊池三郎）把我算作这时期“华南文学”活动家中的一人。平心而论，我这时期不但写作了许多一般文艺的文章，在有关思想见解上也有些跃进的地方。它在我文艺理论活动的整个历程上，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

1949年春，北京解放。这年的5月，我跟其他一些留港的文艺界人士，响应号召，回到首都。开过全国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就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一直连续到现在，已经足足经过43年的岁月了。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个人的经历也相当曲折。这里，我只就学术上的经历和变化谈一下。

在这一大段时期里，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开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夜，第二个段落是那给民族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段落是“四人帮”倒台到现在。在这些段落里还各有些小段落。

自1950年至反右前夜，学界虽然有过思想改造运动，对俞平伯、胡风等的批判运动，但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在其中的第一个段落里，我首先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倡建工作，并被选为该会的负责人。这对我的学术活动（民间文艺学活动）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鼓励和赞助。因此，该会成立不久，由于我的创议，就出版了一个以理论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我当时所写的纲领性的论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文化财产》，就是在它的第一期上发表的。这个刊物虽因抗美援朝战争精简刊物的缘故，只出了三期便停刊了。但是，它对新中国这方面的活动是颇有影响的。我因为自己教学和社会读者的一般需要，又编辑了一本《民间文艺新论集》。由于及时满足了客观要求，它很快就再版了。在这段时期里，我还一些有关的集会（例如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宣扬这方面学术重要性的讲话，或发表这方面的宣传文章。这些活动，是跟我当时在北师大、北大等课堂上的讲授互相配合，多少起到促进这门学术的作用的。在大专院校文科的课程建筑中，我也

极力争取把这门学科列入学生的修习课(当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的名称,叫做“人民口头创作”),但为了适应当时我们高校教师学养的实际情况,把苏联这门课原来的“历史”(文学史)性质改为“概论”性质。直到“三面红旗”运动起来之前,许多高校文科都开设了此课。这对于我们国家这门学科知识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1953年,我们第一个在北师大中文系开办了“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班”。当时就读的同学后来大都成了教授,有的还当了博士生导师。以上这些活动,虽然本身不是我的学术研究活动或成果,但它对于推动我国整个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却有着重大关系。何况它对我个人的学术思想和所从事的事业也同样是很有作用的!我在那些工作过程中增进了专业知识,增加了学术的分析和概括能力。而这种结果,必然要体现在我此后工作的成效上。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正在这条大路上健步前进的时候,一场政治的暴风雨袭来了!在一些时期里,我不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被剥夺了从事学术工作(包括教学)的权利。同时,那种发扬广大人民优越心智、才能的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也几乎被砍杀殆尽。虽然情况如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一些年月里,我的生活和工作虽然并不自由,但我凭着一颗对祖国学术的赤诚的心,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和其他条件,奋力写作了几篇中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有些已经收在这本自选集里)。这是对于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的一种开荒工作,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学术上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那些文章,从现在看来,在某些方面虽不免有些缺点,但它的积极的科学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此外,当时我还挤时间写作了《近代进步思潮与红学》那篇文章。它是对于当时那些非历史主义的红学批评的一种挑战吧。

以上是我在建国后第一个段落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经历,它的前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后期所遭遇的情景是那么肃杀!但是,跟下一个

段落比较起来，它多少还是有节制的，让人能够隐忍生活和偷空工作的。

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段，那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其实是武化)大革命”起来了，而且一直延续了长达10年之久！这是一个真正残酷的年代！过去人们一贯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虐政。但它比起“文革”对文化学术的摧残，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罢了！无怪当时有些“英雄”要以这种超越历史的“功绩”自豪了。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还敢过问那被认为对人民犯罪的学术么？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如果说在这个历史的黑暗时期，我们在知识上、在科学上有什么认识或收获的话，就是那些“英雄”们的所作所为教给我们的历史和政治的“真理”，而这正是我们在任何书本上或文件上所不能读到的，也不是我们凭空所能想象得出来的。这应该说是极宝贵的知识、极难得的收获！尽管全社会和个人所付出的代价是那么惨重！

这就是我在这个不平常的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这也是这个历史时期中的我学术经历的第二个段落。

“穷阴终久要回阳”！不可一世的“英雄”们终于倒下了。历史回复到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我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这时深感到一种解放的快慰！但是，生命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不但许多宝贵的时间被糟蹋了，个人的精力也日见衰退了。但是，只要一息尚存，为建设和推进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志愿就必须实现！我利用当时的形势，竭尽自己的心力，既要对同志们大声疾呼，又要坐下来探索一些问题。寸阴是惜，双脚不停。终于与同志们重建了中国民俗学会，恢复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参加、推动、赞助各省市同类性质机构的恢复或创立。在学校里，我们恢复了民间文学教研室，大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前，不论从整个社会看，还是从我们的教研室情形看，这些新学科都有欣欣向荣的气象。这是70年来所罕见的！

在这10多年里，我个人的精力虽然在教学和社会学术事业上花去不少，但还是争分夺秒地探索了一些学术问题，写写论文及其他文章（如为同志们的著作写序文之类）。近年写作的几篇论文，其中如《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等，多少是花费了一些心力的作品。对于我国这方面整个学术的建立和发展，也多少是有所裨益的。

这是我在建国后这个时期里学术活动的第三个段落，也许还可以说是我生平这方面活动的第三个高峰期吧。

以上简要地叙说了近70年来我在学术活动中的各个时期的境况和得失，它对于本书的读者多少可能提供一些我学术活动的背景材料以及引起某些思考的凭借。就我自己来说，它也许将是诱导进一步的反思之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至于成为一种虚文浮说了。

五

在拨乱反正后所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下，10多年来，我对于学术研究的观点、方法，对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乃至诗学的性质、范围以及功能等，都做了一些反省，有些新的领悟和新的看法。例如，关于研究的观点、方法，我仍然真诚地相信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吸收并改进一切新理论建立起来并发展过来的。它是一种开放的学术体系。它与封闭的、僵硬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态度是无缘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反映现实的思维和方法，也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由此，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其核心，保卫其精华，又要根据新的现实和经过检验的科学成果，加以丰富、补充，使之不断前进、发展。这是我现在所达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基本态度。

至于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乃至诗学等理论的新领悟、新认识，方面颇多，这里只能举一两个例子。譬如关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问题。这是对民间文学性质认识的重要问题。从我个人的思想经历说，在20年代后期以后，我们对它就有模糊认识。后来接触了苏联的民间文学的理论，这种认识就更加明确和强固了。但是，近年在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指导下，我感到自己过去的这种理论认识，多少不免有点简单化，甚至有些武断之处。因为，这方面事实的状态，远比我们过去所认为与表达的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又如对于民俗事象性质的认识，过去也朦胧地知道它是文化现象的一种，但在论述它时，却很少着眼到这方面。鉴于世界学坛交叉科学的大量出现，我近年来意识到有建立一种“民俗文化学”的必要，因此草写了《民俗文化学发凡》那样的倡议性文章。这是我对民俗学这门学科一种新开辟的境地。我希望它能够得到同志们的注意（今年《新华文摘》第一期曾予以摘转）。

总之，个人的学术思想和活动，是随着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向前而进展的。只要生命存在一天，它就绝不会停止。

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为国内学者编纂一套学术著作自选集，这是有利于我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种美举。承主持者的好意，约我提供文稿。因事情比较忙碌，迟迟不能交卷。去年底，该社编辑同志催促甚急，我只得把打算选录和可备选录的一批文章交付连树声同志，请他代为选定、校订和编次。经过3个月的时间，这个“自选集”

的初稿居然出来了。剩下的一个任务就是写《自序》。尽管我刚离开医院，不敢多用脑力，但事在必为，只好草草着笔。以上几段文章，就是它的结果。

像本书开头时所述，我从事这方面的精神活动，已经将满70年了。但是，现在自己看看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一些文章，不禁感到惭愧！它实在不免有些单薄！想起那些写出了许多使我爱读的学术名篇的文章巨子们，我是何等平凡、不长进的后辈和学生！造成这种现象，自然有些客观原因（例如出生地及家庭没有丰厚的文化背景，早年缺少名师指导、督促等等），但是，从主观上说，我自己也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近日披读已故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年谱，得知他去世后，遗留的学术笔记就有近二百册。这在治学上并不算是一件大事。但在这里，我们的前辈表现出对学业的何等专精和坚毅！他学术上的成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单就他做笔记之勤这件事，便不是我所能及的。我学术成果之所以如此寒伧，在这种地方，缺少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就是原因之一吧。我希望像顾颉刚先生那样在学术上精勤的典模，能永为青年学者所继承！它也将使我减少那种自恋和不安吧。

末了，我谨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海同志和为我分劳的连树声同志，致以诚恳的谢意！

1993年5月20日，自序于北师大

励耘红楼，时年九一